唐凯：刺在臂上的党徽，是终身信仰

“这些纪念章，父亲从来没有拿出来给我们看过。”今年6月中旬，北京增光路一老小区里，开国将军唐凯的女儿唐捷小心翼翼地从书柜里拿出一块有些包浆的防潮布，里面包裹着的，是父亲戎马一生获得的各类纪念章。

唐凯，原名唐盛文，1916年10月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蔡梅店（今武汉市黄陂区蔡店街道）。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父亲从不跟我们讲自己，他的很多事是我翻史料、找他的老战友一点点打听来的。”唐捷记得，父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活下来的人，没资格邀功”。

长征途中，唐凯三过草地、多次翻雪山，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长年征战的唐凯将军身上留下12处严重创伤，直至生命结束，他体内仍留存着弹片。



抗日战争时期，抗大二分校部分干部合影，右一为唐凯。 记者胡冬冬 翻拍

把党徽刺上右臂 “娃娃兵”破例加入红军

黄陂蔡店地处大别山南麓，丘陵起伏，田地贫瘠。唐凯就出生在这里的一户赤贫农家。

那年月，黄陂一带几度饿殍遍野，穷人家的孩子活下来就是运气。唐家种的几亩薄田交完租就剩不下几粒粮。唐凯小时候放过牛、打过猪草，和哥哥一起挑货到夏店、河口等地赶集。后来经常随母亲在姚家集等村镇挨户讨饭度日。

1927年11月，黄麻起义爆发。次月，工农革命军鄂东军余部72人转移至木兰山，革命火种吹进蔡店，也在少年唐凯的心里埋下了一颗革命的种子。

1929年，黄陂县方梅区少共书记余尧之来到唐凯家，几次长谈和深入考察之后，决定介绍他加入共青团。那一年，唐凯13岁。

也就在那一年，余尧之用针沾着草木灰，在唐凯右臂刺下中国共产党党徽，镰刀、斧头印记伴随了他一生（注：中国共产党党徽现在规范的图案由镰刀和锤头组成，早年出现过斧头）。

唐捷说：“针把信仰刺在了父亲的皮肤上，也刺进了他的骨头。从那时起，党徽就成了他的革命信仰，至死不悔。”

1930年，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展开“围剿”。战火逼近黄陂，14岁的唐凯领着70多名儿童团员追上红军队伍。连长看到他手臂上镰刀斧头图案清晰可见，深为感动，破例收下了这个“娃娃兵”。同年，唐凯正式参加工农红军，1931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

此后几年，他在红四方面军的队伍里历练。1935年，年仅19岁的唐凯已是历经战火考验的红军团级政委。

受伤后指尖触到印记 坚定活下去

1935年3月底，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时任红31军93师271团政委的唐凯随部强渡，江水冰冷刺骨，木船在炮火中剧烈颠簸。他们上岸后，东岳庙战斗打响。

团部突遭数倍之敌的火力压制，被压在一条山谷之中。子弹从三面山头泼下来，打得泥土飞溅。危急关头，唐凯一把推开团长，吼道：“你指挥部队向山后转移，这里由我负责！”话音未落，他率先跃出堑壕，端起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

就在更换弹夹的瞬间，他忽觉后脑一凉，眼前一黑，栽倒在地。血顺着他的后脑勺汩汩涌出，浸透了领子。

军医从他后脑取出弹头——再往下偏2厘米就击穿脑干。红军缺医少药，没有麻药。医护人员只能用盐水煮过的纱布为他清理伤口——盐水碰到烂肉的瞬间，唐凯就会从昏迷中猛地醒来抽搐一下，又晕了过去。每换一次药，他就疼醒一次，再晕过去一次。

同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重伤未愈的唐凯拄着棍子从担架上蹦下来，兴奋得忘了后脑伤口还在渗血。会师是天大的喜事，但他很快发现：中央红军长途转战翻雪山过来，食盐断绝已久。在高原行军，缺盐意味着四肢无力、伤口溃烂、士气低落——这比子弹还致命。

唐凯坐不住了。他带着战士四处打听，在通司帮助下找到一位藏族老猎人。老人指着远处雪山：“山上有一种白色的石头，含碱，可以熬盐。”

唐凯如获至宝。战士们用刺刀撬、石头砸，把白色石头从雪线岩缝里一块块背下山。架起行军锅，砍来灌木烧火，白色石头在铁锅里翻滚，水汽蒸腾。唐凯守在锅边，眼睛熬得通红，每隔一会儿就用手指蘸一点尝尝——苦的，碱太大。再熬，再尝。反复过滤、沉淀，锅底终于析出一层白色结晶：是盐。

唐凯用手指捻起放进嘴里。咸的！这个19岁的团政委，像个孩子一样咧嘴笑了。

连续几个日夜熬炼，几袋洁白的盐粒送到中央红军驻地。

筹盐之后，更严酷的考验接踵而至。

1935年6月，唐凯随左路军进入松潘草地。茫茫泽国，气候瞬息万变，泥沼暗藏杀机。刚进草地第一天，他的部队就有10余名战士和5匹牲口陷入泥潭，顷刻没了踪影。伸手去拉的人，也被一同吞噬。唐凯急红了眼，不断大吼：“遇到下陷，立刻躺倒翻滚！”这条命令，挽救了许多战士的生命。

因张国焘错误路线，部队北上出草地后又被迫折返，唐凯第二次踏入草地。这一次，粮食吃尽，野菜挖光了，将士们就煮皮带硬咽。一次筹粮途中，部队遭敌军骑兵突袭，唐凯臀部和腿部中弹，血流如注，无法行走。战士们找来门板，绑上绳子抬着他走。

沼泽地里深一脚浅一脚，两名抬担架的战士体力耗尽，再也抬不动，就把他平放在草地上，一人在前拖，一人在后推。泥水没过了膝盖，每挪一步几乎用尽全身力气。

恍惚中，唐凯的手慢慢移向腰间的手枪，他不想拖累战友。就在指尖触到枪柄的那一刻，他摸到了右臂那个凹凸不平的针刺印记。

“父亲后来跟我们讲：印子还在，命不能交。”唐捷回忆，“他忽然笑，说‘我讨过饭挨过枪都没死，命硬，歇会儿再走’。”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唐凯站在欢呼的队伍中，那一年，他20岁。

面对苏军语言不通 卷起袖子亮出“特别通行证”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任冀热辽军区第16军分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唐凯，与司令员曾克林率4000人部队挺进东北。8月30日，部队在苏军炮火配合下一举攻克山海关，打开了八路军进军东北的大门。9月5日，部队坐的列车驶进沈阳南站。

意外发生了。苏军因语言不通、不识八路军着装，将列车团团围住，枪口对准车厢，不准下车。曾克林两次交涉，均因无法证明身份而失败。气氛越来越紧张——苏军开始拉动枪栓，车厢里的八路军战士也握紧了枪。

第三次交涉。唐凯一言不发走上前，猛地卷起右臂的袖子，将那枚刺了16年的镰刀斧头印记，亮在苏军军官面前。

“共产党！毛泽东！”他高声喊道。然后，他压低声音，哼起了《国际歌》。

苏军军官凑近端详，脸上的冰霜瞬间融化。这位军官参加过苏联国内战争和卫国战争，一眼就读懂了这枚印记的含义——这不是文身，不是刺青，这是一个人在13岁那年，把自己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刺进肉里的誓言。苏军军官高声惊呼：“共产党！”随即放低了枪口。曾克林见状，补了一句：“斯大林，乌拉！”一场危机就此化解。

“这枚印记，是他长征路上的灯塔，也意外成为东北战场上的通行证。”唐捷感慨道。

挺进东北后，唐凯历任辽东军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3纵副政委、5纵副政委、第四野战军特种兵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四保临江、辽沈、平津、渡江等重大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唐凯的战场换到了建设一线。他先后担任中央军委民航局副局长，与局长钟赤兵联名打报告开辟新中国第一批自营民航航线。1950年，民航飞机“北京号”启用，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北京”二字。

1952年，陈赓受命筹建军事工程学院，在干部名单上看到唐凯的名字，当即找到罗荣桓：“这个人，我要定了！”

两人的缘分，要追溯到17年前懋功会师时的相遇。当时，陈赓在红一方面军担任军委干部团团长，唐凯任红四方面军二六二团政治委员，两人相遇后一见如故，就此结下情谊。随后的多年征战中，两人尽管很少相聚，却彼此记挂。

此后，唐凯出任军事工程学院工兵工程系主任，又历任工程兵特种工程设计院院长兼政委、工程兵副司令员，参与领导了“两弹一星”基地建设等重大国防工程。

1955年，唐凯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父亲从不炫耀自己。他总说，自己只是个幸存者。那些倒下的战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唐捷说。

1999年8月26日，唐凯将军在北京逝世。整理遗物时，家人才发现那些被珍藏了一生的纪念章，安静地躺在防潮布里。而他右臂上那枚印记，轮廓依然清晰——镰刀、斧头，伴随唐凯历经70年风雨。

记者吴曈